

共同反省「80 後」至今的香港社會

葉蔭聰

2010 年 1 月 11 日

明報MP+觀點版

“「80 後」這三個字，不該只屬 80 年代出生的年輕人，該屬於所有香港人，引領我們共同反省「80 後」至今的香港社會。”

一群被視為「激進」的青年，經常出現在電視畫面與報章頭條，在立法會、中聯辦，還有「五區苦行」，他們難被歸入政治光譜，擾亂着「和諧」社會。難怪這幾天，傳媒很急於為「80 後」起底。

很多人喜歡把「80 後」視為一個新世代，說是社會流動出了問題，二三十歲年輕人無法上位，多少是借用呂大樂的「第四代人」說法；又有人說，是年輕人生於開始變得豐裕的香港，因此，他們追求物質以外的精神價值、社會理想，這大概跟從西方討論「後物質」文化與價值（例如，見 Ronald Inglehart 的著作）。

不過，在香港，其實沒有人認真地調查過這個年齡層的政治傾向，然而，「80 後」已迅速成爲一個恍似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概念，有足夠的社會共性，引起人們尋求各種社會因素，解析這個世代的出現。但是，我總是對這種「類社會學」的想法有懷疑。我認識一些參與反高鐵的「80 後」青年，但是，很難令我信服他們就是這個世代的代表，至少我在學校接觸的學生大部分不是這個模樣，否則，香港可能早就出現巴黎六八年學生起義了。

有趣的是，「80 後」的厲害之處，正在於缺乏代表性，卻具有代表「世代」的能力。他們雖是特立獨行、與眾不同，以非常規的言行表達了對本土社會的情感，灌注成一個特別的世代面目示人。用一個較學術的說法，「80 後」其實是一種運動認同（movement identity），是在社會運動中打造的身分認同，一種身分的論述。

「80 後」這三個字，不僅以少成多，更是以小見大，觸動香港的集體社會想像，關鍵在「80 後」這三個字。試想一下 1980 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？那是官方版本的「香港」的開始。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欽定了香港的制度與生活方式維持不變，各黨各派對所謂「不變」有不同詮釋，但也約略各取所需，漸成共識。八九十年代，是金融與地產資本界定香港命脈的時代，晚期殖民管治更成爲理想

範式。即使中途殺出 1989 年的六四事件，人心惶惶，香港人也表面亢奮，內裏戰戰兢兢，經歷了最後看似繁榮穩定的「黃金年代」。

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

80 後出生的年輕人到底感受到多少？80 年代初，他們尚無法為香港前途擔心，九七前，大概也未學懂炒樓炒股票，然而，當他們懂性之時，卻看到由 80 年代所打造的「香港」是個不怎麼漂亮的神話。回歸之初，已嘗過金融地產所支撐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如何脆弱，揭開「繁榮穩定」的面紗，不是令人自豪的制度，而是延續貧富懸殊、行政官僚獨斷、大資本家把持的香港制度。北京政府與本港特權階級拖着香港政制發展的後腿，50 萬人上街換到的，是 23 條撤回、官員辭任、老董腳痛，說明我們只能防守，卻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；因此，「官商勾結」四字，持續濃罩着每一位特首的龐大陰影。在政經以外，回歸後第一件具文化意義的重大工程，竟然是從美國「借來」的迪士尼（耗資二三百億），以挽救當時香港的危機。當年有份參與拍板興建樂園的曾蔭權，步步高升，注定了不管政府推出任何文化計劃（包括「西九」與一眾文化保育計劃），也難以挽回失落的香港身分。

中產家庭教育充滿黃金年代印記

回歸以來，如何保住褪色與崩潰中的「黃金年代」，是統治階層終日忙碌的籌劃（project），可是，在過程偏偏又錯漏百出，暴露出「黃金年代」的虛妄與腐敗，這正是回歸以來種種變化的主調。除了積極參與政治的「80 後」青年外，大部分同齡人也許對以上的宏觀變動感受還不怎麼深刻，不過，在他們微觀的成長與學習經驗裏，肯定深刻體會到這種主調。近日在網上找到友人蔡穎儀的博士論文，是一個關於迪士尼的香港研究，當中深入探討了香港中產家長如何教導子女。她發現，保護孩子免受外來不良影響，成為中產家長的首要任務，因此，要對孩子作全面監控與規訓，由飲食、身形體重、嗜好、看電視到結交朋友等等皆無一遺漏（難怪香港近年會興起「基督教右翼」）。這樣密集式的親子教育，背後是中產家庭力圖維持階級地位，以至地位晉升的欲望，這一切都充滿着八九十年代「黃金時代」的印記。

港式中產家長的親子教育，與曾俊華最近在網誌所想像的「第四代人」（大概跟「80 後」年齡差不多）互相呼應。曾俊華想像中的「第四代人」渴望「物業會所有什麼設施、泳池有多大、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」，他勉勵年輕人，「社會也提供了很好的環境，只要他們能夠好好把握，好好裝備自己，再加上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，他們是不用擔心日後沒有『上流』的機會。」大概在曾司長與一眾高官的眼中，像高鐵這類大型建設，就是要為年輕人提供「上流」機會。

問題是，「80 後」的年輕人需要什麼？一個漂亮的會所？

近日反高鐵的「80 後」青年很明顯已回答了曾司長，他們身體力行，提出了不一樣的發展理想與政治願景，只是曾司長不太願意聆聽。至於其他「80 後」的青年是否會按着中產家長與曾司長的訓示，努力「上流」？恐怕這不是一個實證的問題，而是一個價值與意識形態爭奪的問題，換言之，我們要保住「黃金時代」？還是香港有更多未來的可能？

「80 後」這三個字，不該只屬 80 年代出生的年輕人，該屬於所有香港人，引領我們共同反省「80 後」至今的香港社會。

延伸閱讀：

1. Choi, Wing Yee Kimburley. 2007. Remade in Hong Kong: Hong Kong People Use Hong Kong Disneyland. PhD Dissertation, Lingnan University. http://dl02.library.ln.edu.hk/ethesis/choi_070925.pdf
2. Inglehart, Ronald. 1990.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.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